

知識天地

台灣戰後歷史的軸心時期與軸心世代：1970 年代的政治、文化變遷與回歸現實世代

蕭阿勤（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晚近二、三十年台灣政治與文化的重要變遷趨勢之一，經常被形容為「本土化」或「台灣化」。關於這種發展的研究，為數眾多，也累積相當多優秀的成果。不過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一個比較缺乏研究的角度，是這種政治、文化變遷與世代的關係。筆者在這裡就以 1970 年代為例，談一談當時「回歸現實」的戰後世代的重要角色。

戰後台灣重大的政治、文化變遷，始於七十年代。就其變遷的顯著程度與廣泛範圍、以及對往後至今深遠的社會影響而言，這個十年可以說是戰後台灣歷史上的「軸心時期」(the Axial Period)。六、七年代之交，經濟起飛後的台灣逐漸面臨農村凋敝、勞資糾紛、貧富不均等問題。七年代初嚴重的外交挫敗，更強烈打擊中國國民黨政府。這些變化，迫使國民黨逐漸形成所謂「革新保台」的政策，而此時也正值由蔣中正到蔣經國的權力交替階段。當時在文化上，「回歸鄉土」的理念與實踐，也日漸發展。

七十年代啟發後續政治重大變遷的積極因素，不是威權統治者及其相當有限度自我調整的革新理念與作法。包括文化的明顯變遷在內，其積極因素都在於一股新的廣泛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它對既有體制的挑戰。這股力量主要來自當時大約 20 到 40 幾歲之間的「戰後世代」。他們不管是本省或外省籍，即使不在台灣出生，也幾乎都在戰後的台灣成長，並接受國民黨體制下教育。

戰後出生的人口遽增，以及高等教育的顯著發展，在六十年代後半期，已經造就了大量的年輕知識階層。戰後世代成為挑戰既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主力，興起於「保衛釣魚台」(保釣)運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的 1971、1972 年期間。從這個時候開始，戰後世代逐漸在台灣政治、文化變遷上顯現其重要性。釣魚台主權爭議、退出聯合國等重大政治事件，是促成這個「回歸現實世代」出現的關鍵因素。在六十年代普遍感到孤懸於歷史之外、與國族命運有所隔閡、對時局發展無能為力，而且感到迷茫抑鬱卻又孤絕自負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因為受到七年代初台灣重大外交挫敗的刺激，廣泛經歷「覺醒」的過程。他們不分省籍背景，都憑藉一個關於中國在 19 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國族歷史敘事，來理解台灣的處境，並且定位自己這一代在其中的責任與使命。他們強烈反省批判上一代與以往自身的「流亡」心態，體悟到深入認識台灣社會、將自我與更廣大的外界現實聯繫起來的重要性，積極要求社會政治改革。因此我們可以用「回歸現實世代」綜括指稱那些積極挑戰政治體制、重構文化趨向的活躍分子，以及有意識批判揚棄流亡漂泊心態的其他廣泛的年輕人。外交挫敗之類的重大傷痛事件，激發年輕世代的強烈世代意識。這些事件使他們從更大的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理解政治、文化現狀，以及他們所屬世代的歷史位置，進而萌生批判意識與行動。這些年輕知識分子透過國族的歷史視野，在時間的洪流中自我定位、尋找意義，而積極地參與並推動政治、文化變遷。

七十年代社會政治改革與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提倡、推動者，與上述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密切相關。他們屬於年輕的戰後世代成員，從其中逐漸浮現，而組成份子相當廣泛，同時包括本、外省籍。相對於為數眾多的整個戰後世代，他們是其中佔少數的知識階層成員而已。但是他們普遍反省批判戰後二十幾年國民黨統治所形塑的流亡心態，以及相關的文化建構與政治體制。他們挑戰既有體制，倡議改革創新的政治與文化理念，是足以扮演關鍵角色的歷史行動者，形塑了歷史變遷的性質與方向。就此而言，台灣的七十年代，猶如德國哲學家雅斯培以「軸心時期」形容人類西元前 500 年左右歷史階段的重要性時所說的：「到那時為止被無意識地接受的觀念、習慣、與環境，都受到審察、質疑、與清理」。如果說七十年代是戰後台灣歷史的軸心時期，那麼戰後世代當中，那些經歷某種覺醒轉化，

具有鮮明的世代認同，在國族歷史敘事中定位自我、世代、與社會，並且發展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理念與實踐的知識青年所構成的回歸現實世代，就其在當時與日後政治與文化上的重要性來說，我們可稱之為戰後至今台灣歷史的「軸心世代」。

從台灣晚近政治、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的發展來說，啟動近 30 年來這種歷史趨勢的軸心時期，正是七十年代。上述當時政經局勢的重大變遷，在政治上激發了以黃信介、康寧祥為首的「新生代」黨外人士要求重視台灣現實、改革政治社會問題、實踐自由民主、保障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言論與行動。在文化上，當時戰後世代的文化界人士致力於發展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而黨外也努力發揚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這些台灣「鄉土」的歷史探索與認同建構，為八十年代之後顯著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準備了素材，而對晚近文化與國族認同的本土化發展影響重大。以本省籍為主的黨外新生代與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發揚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等，是構成回歸現實世代的相當重要的部分。就七十年代對後來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重大影響而言，我們也可以借用雅斯培對人類歷史軸心時期的形容來說，亦即在戰後台灣歷史上，七十年代「產生了我們至今仍在其範圍內思考的重要基本範疇」，樹立了往後至今政治或文化重大變遷的開端。

對當代台灣政治影響重大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島內的發展，主要在八十年代之後。七十年代回歸現實世代關於台灣本身的文化再現及知識建構，圍繞在如何重新認識台灣的過去，以理解現在、規劃未來，因而與八十年代之後「台灣史觀」或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發展，密切相關。回歸現實世代當中與後來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與文化建構最密切相關的三群成員，正是上述發揚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鄉土小說家與支持者、以及黨外新生代。

基於戰後世代在七十年代政治、文化變遷中的重要角色，我們可以稱之為戰後台灣的軸心世代；同時基於其對政治、文化體制或傳統的批判傾向，我們可稱之為回歸現實世代。不過這樣的指稱，並不是說他們在具體的政治、文化主張上，完全同質一致。不過七十年代一個實然現象，是當時不分省籍的戰後世代成員，都普遍發展回歸現實理念。從這個回歸現實世代當中，又浮現上述與後來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與文化建構最密切相關的三群成員。從 20 世紀初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後，台灣的戰後世代是在社會繁榮穩定中透過學校正式教育而充分接受國民黨的國族認同教化的第一代人。不僅對外省籍、也對本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而言，這樣教化的結果相當顯著而有效。因此黨外新生代、發揚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以及鄉土小說家及支持者，都顯現清晰的中國國族認同，反映相關歷史敘事對他們的形塑作用。這與八十年代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國族認同固然不同，但是他們挖掘台灣的過去，重視現實與鄉土，確實構成八十年代之後政治、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源頭。從世代的角度切入，探究八十年代之後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在前一個十年的起源，的確有助於拓深我們對於晚近台灣政治、文化變遷的理解。